专栏

·门外弹乐·

武汉爱乐“对话世界”

□梅明蕾

梅明蕾 媒体人,爱乐者,读写驳杂。

关注一个交响乐团,最好的途径是聆赏她的音乐会。一段时间以来,以我的眼光,武汉爱乐的音乐会呈现出更开放、更丰富的样态,其中自然包括品质或水准的提升。

说到水准的提升,一个以演绎古典(经典)音乐为己任的城市交响乐团,业务上应朝着怎样的方向精进呢?武汉爱乐于去年9月发布的2024—2025新乐季中,将“对话世界”列为最靠前的目标。

“对话世界”是全方位的。最直接的操作,便是乐团与享有世界声誉的指挥家、演奏家乃至同行精诚合作,从中开阔视野、学习高明、认知并改善自身不足,从而相携共进。

音乐会是“对话世界”的载体。新乐季中的演出我虽未能每次聆赏,却从几场留下印象的音乐会上,领略到武汉爱乐的努力和变化。

2024—2025乐季开场音乐会,是乐团音乐总监傅人长指挥贝多芬第九交响曲。傅老师曾长期客座武汉爱乐,早在武汉乐迷心中刻下印记。前年终于正式加盟乐团,又从不同渠道得知其富于才情、努力敬业的一面,更有迅速开创乐团事业新局面的事实,彰显了指挥作为乐团“灵魂”的存在。这场贝九,乐团、合唱队及独唱、重唱歌唱家在傅人长执棒下全情投入,合力奏(唱)响充满英雄气概和世界大同理想的壮歌,人在现场沉浸其中,获得一种难忘的音乐体验。表演团队虽皆属本土,但因贝九音乐思想的高度世界性,音乐会庶几可作武汉爱乐“对话世界”的宣示。

更加名副其实的“对话世界”,则是在第十三届琴台音乐节期间,武汉爱乐与国际一流的法兰克福广播交响乐团合作的两场音乐会,先是法兰克福广交室内乐专场音乐会特邀武汉爱乐演奏家加入;再由傅人长执棒,两个乐团合作演绎布鲁克纳第七交响曲。在乐迷眼中,法兰克福广交室内乐演奏训练有素、配合默契,另有大师级演奏家(如低音提琴家福托克等)昭然出彩,种种表现无愧名团风范;而唱主角的傅人长指挥和武汉爱乐,在布鲁克纳第七交响曲浑沉广阔、深邃神秘的音乐世界中表现不俗,同样获得现场听(观)众发自内心的喝彩。

最有“对话”象征的演出,或是匈牙利著名小提琴家罗比·拉卡托斯与武汉爱乐合作的那场音乐会,一曲雅俗共赏的《查尔达什舞曲》,拉卡托斯和武汉爱乐首席李嘉交替担任SOLO或领奏,二人时而竞技,时而交流,恰似用音乐“对话”,意味深长。

看新乐季安排,已经和即将与武汉爱乐合作“对话”的业界大师、精英翘楚络绎不绝。而对话意味着“对等”,意味着乐团应竖起新的业务标高,意味着需提升自我的底气。对于乐团,这或是更大的挑战。

一段时间以来,武汉爱乐变化可谓明显,这里不多说。只想到两个不乏深意的细节:一是我市知名音乐人梅笃信的洋女婿、世界顶级的美国芝加哥交响乐团贝斯演奏家乔纳森·西吉斯,每次回汉短期休假,总不忘打着节拍器一丝不苟练音阶。二是每有国际名家指挥武汉爱乐的音乐会,总能见到傅人长老师坐在观众席静静观摩,其专注的目光令我难以忘怀。

不积跬步,无以至千里。“对话世界”的漫漫长路,必须得以这样的姿态,扎扎实实走下去。

·序跋集·

从五道庙到沙滩

□杨早

摘编自杨早《五道庙与沙滩:舆论启蒙下的北京1904—1918》序章。

1941年12月26日,已经沦陷的香港,宵禁中的黑夜格外漫长。两位滞留在港的朋友无事可做,只能在黑暗中长谈,等待黎明。其中一位是知名报人、《光明报》经理萨空了,当时他正在读英国报纸发展史,于是顺便谈到了中国“最早的报纸”,在萨空了的记忆中,那应该是他小时候最喜欢的《启蒙画报》:“这个画报灌输了许多科学常识给我,像瓦特因为水沸发明蒸汽机、世界人种的分类、五大洲的形状,我都是由该画报而知道的……《启蒙画报》,在北方是一个中国画报史中值得大书特书的画报。”

令人惊异的是,他对话的朋友、知名民主人士梁漱溟告诉他,《启蒙画报》的创办人彭翼仲是自己的姻伯与启蒙老师。小时候,梁漱溟几乎目睹了每一期《启蒙画报》与《京话日报》的印刷!萨空了大为惊叹,他感慨说:“彭翼仲是我在很小的时候,便留有强烈印象的一个新闻界前辈。为了办报指摘当道,曾充军新疆。可是赦还之后,依然在报上再接再厉地言所欲言,在文体上讲,用通俗文字,在报纸上述说大道理,他也是开山大师,可是这个名字已渐在中国社会中被遗忘了!”(萨空了《香港沦陷日记》)

萨空了的感慨正好描绘了一条路线图:《启蒙画报》“灌输了许多科学常识”——彭翼仲“办报指摘当道”“用通俗文字,在报纸上述说大道理”——他的名字“渐渐在中国社会被遗忘”。这正是清末民初北京启蒙运动与舆论版图的变化轨迹。

北京的报业,清末时期基本集中于琉璃厂,尤其是五道庙一带。1904年,彭翼仲愤慨于“人民无教育,不明所以爱国之道”,从儿童教育入手,渐及民众启蒙,先后创办《启蒙画报》《京话日报》《中华报》。

此时的北京,称得上现代报纸的,无非是日资的《顺天时报》(1901年创办),德资的《北京报》(1904年创办),前者馆址在北新华街,后者馆址在琉璃厂,彭翼仲创办的三种报纸(包括他自办的“蒙养学堂”),馆址在五道庙路西。再加上此前由黄中慧创办于1901年、停刊于1902年的《京话报》,馆址设在琉璃厂工艺厂。这几种报纸里,又以《京话日报》影响最大,“流布北方各省,大为风气先导。东及奉、黑,西及陕、甘,凡言维新爱国者莫不响应传播,而都下商家百姓于《京话日报》则尤人手一纸,家有其书,虽妇孺无不知有彭先生”(《桂林梁先生遗书》)。

如果以《京话日报》报馆为起点,向西北则有早年位于安徽会馆的《强学报》馆旧址,向西南则有位于魏染胡同的《京报》馆,以及创办《公言报》《社会日报》的林白水住地(棉花头条,同时也是《社会日报》馆址)。《顺天时报》馆址虽然在城内的北新华街,但它是“进了和平门,望着靠东边第一家”,离靠着南新华街的琉璃厂与五道庙并不算远。因此,绘制清末民初北京的舆论版图,当以琉璃厂五道庙为中心。

1917年,陈独秀将《新青年》编辑部移到北京。1918年12月,《每周评论》创刊,与《新青年》承担不同的时效与功能。几乎是同时,北大部分学生主办的《新潮》创刊,《新潮》将受众下调至“有一定教育程度的中小学生”,与《新青年》《每周评论》构成立体的传媒矩阵。

这三家刊物的编辑部地址均在沙滩一带,再加上外围受新文化影响的《国民》、反对新文化的《国故》(均由北大学生创办),《京报》创始人邵飘萍也应邀加入北大,担任新闻学研究会讲师,如此一来,以沙滩为中心的舆论新阵营成形,并与琉璃厂五道庙为中心的旧舆论阵营形成某种对峙的态势。

·书里书外·

为“藏书票”向杨绛道歉

□李昕

李昕 出版家,三联书店前总编辑。

2009年夏天,北京三联书店要再版《陈寅恪集》,做一个“限量珍藏版”,为此联系了江苏省新华书店总店,希望他们包销。他们同意包销2000套,但是要求我们制作2000张藏书票随书附赠。

藏书票怎么设计?美编计划采用陈寅恪先生名句,下面加上陈先生的印章。

使用印章,需要征求作者家属意见。但陈寅恪先生的三个女儿对版权都不熟悉,一时不知该如何处理。编辑便告诉她们,使用印章做藏书票,这事情不新鲜。上次《钱锺书集》第二版也是由江苏省新华书店包销,也曾用钱先生的印章做了一批藏书票。《陈寅恪集》只是循旧例而已。帮杨绛料理版权的是吴宓先生的女儿吴学昭老师,陈家姐妹也与吴学昭熟悉,她们便向吴学昭请教。

吴学昭把这事向杨绛先生通报。杨先生说:“藏书票,用印章,这事我怎么不知道?”原来,事前无论是我还是编辑,都没有意识到需要和杨先生沟通,出书以后也忘记将藏书票送给老人家过目。

杨先生生气了。她说:“你们这样不尊重作者,我要考虑提前结束与‘三联’的合作。”当编辑把杨先生这番话告诉我时,我顿时蒙住,血一下就涌到脑门上。

事后我才弄明白,杨先生之所以把问题看得很严重,主要是因为她了解到,有人在网上高价拍卖带有藏书票的《钱锺书集》第二版。她担心此事是出版社所为,这些著作的版税她自己分文不取,全部捐献出去,但是出版社却用这种方法获取暴利,岂不可耻可恶?

无奈,我只好请吴学昭老师帮我安排,我要去负荆请罪。吴老师说,老人家现在气头上,怎么会见你?她建议我写一封道歉信,直寄杨府。

于是我便写信解释说:2007年10月我们应江苏省新华书店总店的要求,印制了《钱锺书集》精装本3000套,全部交给该书店包销,自己只留了几十套样书;书店方面为推广促销,建议我们给每一套书夹一张藏书票;我们考虑到《钱锺书集》第一版出版后,我们曾为配有红木架的收藏本制作过一批藏书票,其中也使用了钱先生的印章,现在趁第二版精装本再做一次,似乎不是什么新问题,于是便同意了;我们赶制的3000张藏书票是单独包装后另寄南京的。这些藏书票夹在书里或贴在书上的事情都是书店自己完成的,以后的情况我们也没有再过问;所以,我们到今天也没有见过夹着藏书票的《钱锺书集》第二版;正是因为如此,在给您送样书的时候,编辑早已把这回事忘记了;这确实是我们工作上的一个漏洞,我非常惭愧和不安,在此恳求您的原谅。

信写好后,我找到出版制作部主任,问他两年前做的《钱锺书集》藏书票,他手里还有样品没有?他迟疑了一下,说,“我找找”,便拉开了办公桌的抽屉,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件地往外拿。当抽屉的底部露出时,我看到几枚钱锺书印章制作的藏书票安静地平躺在那里,编号3001—3004。我如获至宝,将它们和道歉信一起邮寄给杨先生,告诉她,这是残存的几枚。我想,可能就是这几枚藏书票的编号说明了问题,解除了老人家的误解。因为这批藏书票是专为江苏省新华书店特制的,1—3000号全部寄给他们,不在“三联”手里,而编号3001以后的几枚,两年来无人动用,表明在网上高价倒卖的人与北京“三联”无关。

信寄出两天之后,吴学昭老师给我来电话说,杨绛先生看了你的信,让我带给你一句话:“李昕是我老同事的儿子,我原谅他了。欢迎他有空到家里来坐坐。”杨先生改变了态度,令我如释重负。我知道,老人家真正关注和在意的,其实不是别的,而是诚信。

《傲慢与偏见》和林黛玉的家产

◀《命若朝霜:〈红楼梦〉里的法律、社会与女性》 柯岚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《命若朝霜:〈红楼梦〉里的法律、社会与女性》,书名源于曹植诗句“天地无终极,人命若朝霜”。

作者柯岚,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中国法学会法治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,央视《法律讲堂》主讲人。她聚焦《红楼梦》中十二位(类)女性角色,对应十二个清代法制问题,整理与《红楼梦》中事件类似的清代司法案例,剖析清代女性困境的制度性原因,考察了清代性别、家庭、法律、政治间的互动与演变。书中不仅使用大量来自《大清律例》《清会典》《刑案汇览》的材料,还从清代的奏折、起居录、笔记、地方志等文献之中整理出相关的案件记录和议论,并综合汉、晋、唐、宋等朝代的法律和案例展开分析。

作者立足“法学与文学”研究路径,聚焦人口拐卖、生育、财产分配、官员考核等社会议题,分析了《红楼梦》作者及书内女性角色如何受到当时礼教与法律的限制、如何做出反抗与批判,展现了一个立体、动态的清代社会。她认为:“如果不和清代的法律与社会相印证,很多《红楼梦》里的人物都无法被完整理解。”

【书摘】

贾琏护送林黛玉的双重使命

大约在和曹雪芹差不多相同的时代,奥斯汀在英国写出了《傲慢与偏见》,书中乡绅班纳特先生的五个女儿都不能继承他的庄园,他的远亲科林斯要成为他产业的继承人。奥斯汀比起曹雪芹同时代的中国女性,要多一些自由度,她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,也能自己选择恋爱对象,还可以指望以写作谋生,但她笔下的女主人公,仍然面临继承财产方面的困境。无独有偶,曹雪芹在稍早三四十年的时候写出了《红楼梦》,他最钟爱的女主角林黛玉似乎也遭遇了差不多的困境。

黛玉进贾府成了一个孤女,她的父母很疼爱她,但法律并没有给她全面的保障,假如林家的族人执意相争,她很可能失去继承权,顶多能得到一份嫁妆。

林如海写信来说自己病重要接黛玉回去时,贾母忧心忡忡,她预感到了林如海将不久于人世,假如这时她不肩负起监护人的责任,让贾府出面来据理力争,孤苦无依的外孙女可能都分不到她父亲的遗产,而这份遗产中应该还包括贾敏出嫁时带去的巨额嫁妆。贾母很快就决定派贾琏送黛玉回去,贾琏的使命不仅是要保证黛玉安全来去,更重要的,他要在万一林如海病重死后为黛玉争得继承权。

生员徐鎧的真实案例

日本学者滋贺秀三指出,明清法律都没有明确规定遗嘱的效力问题,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可能认可遗嘱的效力。清朝初年曾经有一个真实的判例,就是一个父亲排除了侄子的继承权,通过遗嘱将财产留给了庶出的女儿。生员徐鎧因为妻子没有子女,娶杨氏为小妾,杨氏生下了一个女儿。他的侄子徐浃是个品行不好的青年。徐鎧得了重病,同学吕日昌、田一泰和他交好,他就将五岁的女儿许配给吕日昌的儿子,预先送去了陪嫁的首饰衣物,还拨出田产作为女儿的嫁妆田。并让小妾杨氏改嫁给田一泰,让田家善待自己的女儿,把她抚养成人,等她长大后嫁到吕家去。他亲笔写下了遗嘱,处分完毕。死后他的侄子告到官府,认为自己才有继承权,遗嘱处分无效。县令判决认为徐鎧的遗嘱处分适当,应为有效。

由此可见,清代遗嘱继承并不必然发生效力,假如死者家族中的其他男性有不同意见,可能发生争执告到官府,但是司法仍然可以认可遗嘱的效力。《红楼梦》没有写林黛玉回扬州这一段发生了什么,林如海非常疼爱他的女儿,假如他临终立下遗嘱把财产留给他的女儿是可能得到司法认可的。

《红楼梦》第十六回写秦钟临死时,宝玉赶着去见他最后一面,带了几个仆人,“来至秦钟门首,悄无一人,遥蜂拥至内室,唬得秦钟的两个远房婶母并几个弟兄都藏之不迭”(第十六回)。秦钟的姐姐死了,父亲也死了,他也快死了,他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,秦家这时面临的也是“户绝”,秦可卿的死给她的家族换来了一笔巨款,秦业还有留积下的三四千两银子。脂评本《红楼梦》在此处有一句批语:“妙!这婶母兄弟是特来等分绝户家私的,不表可知。”户绝的家庭会有远房的族人来等着分家私,看来是当时社会的常态。估计林家的族人也不例外。作者写到这一点,也说明他十分了解当时关于“户绝”的法律。

林家还有一些同姓的远亲。《红楼梦》第五十五回写紫鹃假意试探宝玉的心意,骗他说林家的人要来接黛玉回去,宝玉急火攻心差点要疯,后来紫鹃说了实情他才好过来。紫鹃说:“那些顽话都是我编的。林家实没了人口,纵有也是极远的。族中也都不在苏州住,各省流寓不定。纵有人来接,老太太必不放去的。”

这话很有意思,可以想象,就算林如海死时林家的族人有意为他立嗣争夺财产,他们又怎么可能跟财大势大的贾府对抗呢?

贾母是称职的监护人

贾母应该是接受了林如海的托孤,为他的女儿代管财产。

细读《红楼梦》,其实可以看到贾母对黛玉财产的安排。贾府里的人都是要发月钱的,每个月大家都有固定的零花钱。一般月钱是由王熙凤发放的,她会到贾府银库里领钱,按照标准发放给每个人。但是林黛玉和她的丫鬟们,月钱却不是王熙凤发的。

《红楼梦》第二十六回写小丫头佳蕙向小红说起她得了意外之财:“可巧老太太那里给林姑娘送钱来,正分给他们的丫头们呢。见我去了,林姑娘就抓了两把给我,也不知多少。你替我收着。”原来林黛玉和她的丫鬟们的月钱是从贾母处送出的,和别人都不一样。黛玉顺手就抓了两把给碰巧来送茶叶的小丫鬟,这个细节说明她很清楚这些钱是属于她自己的,贾母是她的监护人,为她代管财产。林如海死的时候黛玉很小,也许很多事情并不明白,但是贾母这样特地安排,用和别人都不一样的方式来给她发月钱,说明她是一个称职的监护人,并没有向黛玉隐瞒她父亲的遗产,等黛玉大一点了,她会把遗产的事情告诉黛玉。

黛玉向宝钗抱怨说自己“一无所有”,应该只是情绪性的话。她本性善良,对钱财并没有太多概念,也许她觉得既然父亲把自己托付给了外祖母,父亲的财产就应该由外祖母来处置,自己孤苦无依来到贾府,各种事务都要靠贾府操持,她不觉得那些钱是完全属于她自己的。

她用一百多张手绘图详述古书修复

▲ 修补书页

◀ “我的修书工具”

▶ 《微相入:妙手修古书》 王岚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

“我是一名古籍修复师,让历经虫蛀水湮火蚀的古书焕发新生,就是我的工作。”

首都图书馆副研究员、古籍修复师王岚,手绘一百多张图,详细讲述古书的历劫、修复的工具、修复的技艺,以及人与书的缘分。古籍文献传至今天,其价值已经超越书籍本身。修复古籍,同时也是在修复一段多元而生动的记忆——它们是古代的书册、曾经的纸张、当年的笔墨、不朽的艺术、一个时代的审美,或许也是下一个时代的尘土。

至少,在我们当下,应该尽量保存、珍藏这段过往、这段乡愁。这也是修书的意义所在。

《微相入:妙手修古书》,告诉我们古书的历劫与修复,还有人和书的缘分。

这些传统技艺哪怕与大多数人并无实际联系,仍不免在提到或见到它们时被撩动心绪,会忍不住想去了解、想去靠近。相信看到这本书的读者会理解修书人精神上的乡愁,并将这份感动一代一代地继续传播开去。

【书摘】

留下一点水痕也无妨

几年前,我在国家图书馆参加学习期间,曾向朱老师请教关于书页清洗的问题,原以为老师会指导一两种如何彻底洗干净的妙招。没想到朱老师却说:“其实留下一点水痕也无妨。”

我很疑惑:不洗干净也行吗?

见我不解,他饶有兴致地从电脑中找出《韶山毛氏族谱》修复前后的对比照片。修复前,书页纸张因浸水变得褶皱不堪,水渍所形成的黄褐色边缘非常明显。修复后,书页平整干净了许多,但细看之下,却有一弯淡淡的水痕在书页上若隐若现,并不遮挡文字,却更为书册平添了一抹岁月的痕迹。

朱老师说:“特意不洗干净,一来是避免大水引起纸张收缩,进而影响原貌;二来纸上留下一点水痕也是告诉后人,这本书曾经被水洇过,破损痕迹也是书籍递藏过程中的一部分啊!”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修复方式,这番解说让我既震惊又钦佩。

常说不要把古籍修到全新,要保留一点书中的“旧气”,可若论“旧”到何种程度,似乎无法量化,只能在实践中反复揣摩思考,才能理解“旧”的含义——故纸旧气,不仅指当年的装帧,纸张的材料,还包含了书籍在时间旅程中的一段往昔,乃至一段致损经历,这些都是可以传递给后世的历史信息。

当然,前提是在不影响阅读和书籍寿命的基础上进行处理。至于方法么,还要因书而论、因损而定。没有一种修复方式是十全十美的,对破损文献的处理皆是当时当下的权宜选择。在敦煌遗书展上,胡玉清老师看到曾经的修复成果,感慨地告诉我:限于当时的工作条件,卷子的补纸只有乾隆高丽纸一种,不像现在有许多种可供挑选的材料,更没有纸张检测等科技辅助。相比敦煌遗书原本细密光滑的纸质,乾隆高丽纸略显粗糙,以至多年后再看,深感这件藏品的修复还有诸多不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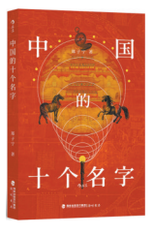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赞扬前辈的修复成果,老师则着眼于当年修复的不足。科技在进步,就古籍补纸而言,早已从当初仅有的几种,发展到如今多种多样,甚至能为修复一套书专门订制补纸。或许在不久的将来,AI智能的应用还会带来新的修书技术以及更加完善的修复理念。到那时,我们现在的修复技法也会被取代亦说不定呢。

快览>>>

《首发经济:中国消费变革新驱动》
朱克力 刘典 著 中信出版集团

从首店、首展、首秀,到新技术、新模式、新场景的首次亮相,首发经济以“首”为切口,撬动消费变革、产业转型与城市焕新。首发经济绝不仅是产品发布的仪式,更是一场关于创新、信任与未来信心的集体叙事。本书全面解读首发经济,探讨了首发经济如何成为2025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着力点。

《中国的十个名字》
郑子宁 著 海峡书局出版社



语言是文明的密码,文字是通往历史的桥梁,从“Chin”到“China”,从“桃花石”到“摩诃至那”,本书以十篇主题故事为脉络,以不同时期其他文明对我们伟大祖国的多样称呼为切入点,深入探讨了语言流变背后引人入胜的中西文化交流史,展开了一场横跨三千年的“语言考古”。

《我们的世界叙事:12位中国人访谈录》
刘娜 著 商务印书馆

这是一部以“世界叙事下的中国人”为主题的访谈录,是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生动范例。书中12位受访者,有环游半个世界的骑行客、年轻的人类学学者、自然探索者、国际琵琶推广人、女性战地摄影师、国际纪录片制片人、自由撰稿人、前驻外记者……他们的精彩故事,代表了中国人未来的“世界观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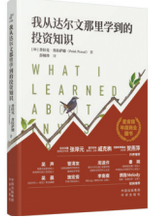
《与哀伤共处: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子女》
李昀鋆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

13个月的田野调查,作者聚焦一个被长期忽视的庞大群体——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子女。书中44位年轻子女不仅讲述了自己的人生故事,也为不知所措的失亲者提供了建议。他们极力隐藏的哀伤故事,也是每一个人都将面对的人生课题。因为正如作者所言,“我们所有人都是、正是或曾经是,与哀伤共处的人”。

《黄仁勋:英伟达之芯》
[美]斯蒂芬·威特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

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权威采访传记,英伟达给予极大的访问权限,作者与黄仁勋多次面对面深度沟通,采访了他的家人、朋友、联合创始人、合作伙伴以及英伟达员工将近200人。呈现一个“过于”真实的黄仁勋和他的英伟达,揭秘黄仁勋的传奇人生、管理之道、技术之思以及英伟达的商业秘密。

《我从达尔文那里学到的投资知识》
[印]普拉克·普拉萨德 著 中译出版社



国内首部跨界生物进化与投资学之作,从熊蜂的生存智慧推导出“避险”比“捡漏”重要;从银狐驯化实验得出常见的指标无法反映企业的真实情况;绿蛙模仿声音的故事教你如何识别企业的虚假信号……使读者理解规避较大风险、以合理价格购入高质量股票、不轻易买进更不轻易卖出的三大投资箴言。

(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整理)